

近代天津教育中的陆军军医学堂

王伟凯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汇集地,近代以来,天津教育发展颇为兴盛,除新式普通学校教育外,专门的近代化医学教育也引进天津,如北洋医学堂和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就是明显的标志。

北洋医学堂又名天津医学堂,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地址位于天津海大道(今大沽北路),学堂按照西方医学学校的标准设置课程,并聘请中外医生担任教习。

除北洋医学堂外,1902年十一月,袁世凯在天津又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进行军医方向的专业培养。从北洋军医学堂毕业的学生,“列入优等生,派赴东西各国学习,由官给费。列入次等者,则发给文凭,派赴各营充当军医”,如首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就被学堂派往各处军营担任副医官和医长。



北洋军医学堂的创建

1901年十一月,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对军医情况很是了解。袁世凯认为,“军政之不振,多由军学之不精,实由科学之不讲。东西各国,崇尚教育,医技器械皆设专科,以专科之学问,定军佐之职司,是以士饱马腾,虽襄创异伤而愈奋……臣援遵照新章,参酌西法,谨于武备各学堂外,区设专门各学堂,曰军医学堂”。

1902年九月,清政府批准在天津设立行营军医学堂,“以为养成军医人材之所”,并命名为北洋军医学堂,同时任命天津候补道徐华清为总办,唐文源为监督,聘日本二等军医正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正式启动招生工作。“北洋军医学堂奉委凌太守(天津知府凌福彭)招募学生一则,业志本报,兹闻定于二十一日起,所有赴府投考者,均须开明年貌、三代、籍贯、取具、妥保,凌太守一面挑选,一面订于十一月初二日在辅仁书院当堂会考”。

关于考试题目,当时的《大公报》在1902年12月6日“中外近事”栏目进行了详细报道,“军医学堂于初二日在辅仁书院招考学生,兹闻是日辰时,总办徐观察华清、天津府凌太守及日本教习场监试,招考学生百余名。今将各题录下,汉文题:直隶海口及内地防疫办法愿闻大略;英文题:水学化学翻译一篇、算学一篇;法文题:祝军医学堂文题一篇;日文题:水学化学翻译题各一篇。”通过考题可见,学堂对考生的外文水平要求颇高,且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者才能应对考试,所以报考的学生多是在同文馆(清末建立的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的专门外语学校)学习过的生员。最后从百名考生中录取了正生40名,备生6名。转年6月又通过复试,从46人中录取了37人作为正备生,其余9人则作为附学生。

北洋军医学堂设立之初,就做了修建校舍的规划和准备,但因开学迫在眉睫,于是便将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原浙江海运局作为临时校舍,学堂面积虽然较小,但整体环境还不错,“略种花草,明媚芬芳,风景清幽,尚勘小住”。学堂开办后,袁世凯感觉“海运局地甚狭小”,于是一度将学堂迁至陆军医院内,同时又与北洋医学堂协商,拟借用该学堂地方,然由于其所能挪让者“又为铁路局办公之地,一时未能腾让”,遂议定“在三叉河口东关地”另建新址。

北洋军医学堂的发展

由于当时社会比较封闭,人们对近代医学认知基本处于懵懂状态甚至存在盲区,于是在1903年出台的《军医学堂章程》中就推行近代医学向社会进行了解释,“军医专习西法,行军所需药物以简为要,华医药味太多,不易齐备,不若西医用法捷而备药简也”“军医以伤科为重,凡跌打损伤等症,中医旧传有妙法验方,亦须学习,以助西法之不足”。

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上,学堂则借用新式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制定了管理办法,从培养目标、课程、报考要求、待遇和出路等方面作了严格规定:(一)目标:专以培养陆军军医人才为宗旨。学生毕业后直接向各营派遣,充当医官,不准另就他业。(二)课程:以研究东西医学为正课,兼习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日文和国文。其课程第一年是: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组织学及实习、胎生学、算学、汉文、日文、英文;第二年是:解剖学、生理学及实习、病理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物学、汉文、日文、绷带学、药方学;第三年是:内科学、外科分论、眼科学、产科学、妇科学、儿科、传染病学、普通卫生学、内外科门诊、汉文、日文、军营外科学、军营卫生学;第四年是:内科学、外科分论、眼科学、皮肤病学、耳鼻咽喉科学、产科实习、细菌学、法医学、精神病学、内外眼妇婴科诊疗、军队卫生事务、军事学、汉文、日文、学堂卫生学、工业卫生学等。(三)报考要求:年龄须在18岁至25岁,资质聪敏、身体强壮、文理通顺者,在考试基础上,准许临时入学。三个月后经过复试合格,准许正式入学。(四)待遇:一切学资由官方供给,每月供给饭费4两,另外给予零用钱,上级生每月6两,下级生每月3两,其他还供给笔、纸、墨、书籍以及茶、灯、烛等。在年终考试中若达到最优等者,酌给奖赏,连续获得优等者,每月增加零用钱作为奖励。(五)出路:毕业后担任军医长,经过三年任职,由练兵处选拔成绩显著者担任副军医官,经过六年任职且工作勤劳卓著,升任正军医。此外,还选拔毕业生中优等者,到海外学习专门医科。

1904年秋,根据教学需要,学堂决定增设解剖学科,由于解剖学是一门实操课程,而当时“中国风气未开,不敢骤然试



学堂在天津的位置地图(绘制于1913年5月)

验,仅以猪羊等畜代之”。1906年,总教习平贺精次郎“以解剖课程仅纸上空谈,不若实行经验,特从外洋购来全蜡人型一具,令各学生一一拆卸,复一一安装,以期久习,洞悉人身作用”。同年,学堂新校舍在今河北区黄纬路落成,学校正门朝南,校舍为欧式建筑,能容纳200多名学生,与当时的马公祠毗邻。

北洋军医学堂的更名

在发展过程中,学堂不断完善设施和学科建设,包括建立附属医院,增设药科、防疫科等。如1905年在水师营旧址成立天津官医院,作为北洋军医学堂的附属医院,同时“分设官医院一区,内设药剂,所拨学生数名,专习调和药品之术”。1906年春夏之交,又开办防疫医院,“招考学生一班,专门肄习牛痘,一年卒业后,派赴卫生局所,充当军医”。附属医院总办由学堂总办徐华清兼任,但医院规模较小,只能收容三十个病人,“只有教学用患者、中国的军人及巡警等,才准许住院”。学堂的各位教习轮流到医院开展工作,一是为学生进行临床讲授,二是对患者进行诊疗。

1906年,清政府组建陆军部,下设军医司,掌管全国陆军的卫生、医疗、医药和军医教育等事项。1907年陆军部接管北洋军医学堂,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并修订公布了《军

医学堂试行简章》,增加生源来源地。陆军部咨行学部称,“原额六十名,除由津、保两中学堂考选四十名外,其余二十名,拟由贵部饬行京师各中学堂选定合格学生,并取具甘结、保结及该生等年籍清册,一并如期径送”陆军军医学堂参加考试。据曾在学堂任教的伍连德回忆,1909年前后的陆军军医学堂“有从全国各高中毕业的学生200余人,年龄在17岁到22岁之间”。

清政府灭亡后,陆军军医学堂改称陆军军医学校,仍隶属陆军部,“内部一切悉仍旧”。1913年夏天,学校因在册学生已达310名,为强化军事意识,将全校学生编为3个连,实行军事化教学管理。每周放假一天,星期六下午二时回家,但星期日晚八时前必须返校,宿舍每间住六七人,晚上自习到十时睡觉,均以军号为准。1914年,陆军军医学校开辟药用植物园,以增补学生普通医药学知识,时人曾赞,“凡医、药等科,应具者已大致布置完备”。

1916年,陆军部决定在陆军军医学校开办本科及研究、补习各科,但鉴于校舍偏僻,决定迁校北京,1917年春开始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东四六条胡同东口的富新仓旧址一带建校。1918年12月新校址竣工后,学校迁往北京。1933年5月,陆军军医学校又奉令迁至南京汉府街,作为黄埔军校附属学校之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该校又先后迁往广州、桂林和贵州安顺等地。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后又转往台湾办学至今。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发给该校毕业生刘国庆的毕业证书

历史随笔

刘晏的“正”

清风慕竹

刘晏还在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这些数据也成了决策的依据,每当预测到粮食可能歉收,他就会先行上报,什么时候需要免除若干赋税,什么时候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不等州县申请,便已上奏实施,这样在灾害之年对百姓的赈济从来没错过时机。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增多起来。

刘晏常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爱护百姓,不在于直接赏赐财物,而在于能够让他们安心耕作纺织、创造财富。在正常年景公平征收赋税,在灾荒年份则减免赋税并给予救济。国家赋税的增加,不是靠横征暴敛,而是让百姓休养生息,百姓生活好了,人口多了,相当于税基做大了,最终就达到了“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目标。金章宗完颜璟后来评价说:“理财安得如刘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

刘晏身为宰相,手握财权,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而他自己却十分清廉,生活极其俭朴。他住的房子矮小简陋,家中连一个仆人都没有,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宰相的府邸。《唐国史补》是这样描述刘晏的生活方式的:“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居住追求实用舒适,不贪慕豪华屋舍;饮食追求吃饱适口,不追求多样珍馐;马匹追求稳健可靠,不挑剔毛色外观。

在贪腐成风的世道里,刘晏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安史之乱期间,宰相元载的党羽、时任同平章事王缙向唐肃宗密奏:“刘晏每日随携贴封条之箱入朝,退朝辄返私邸,疑藏逆物。”肃宗起初不信,但因多人附和而生疑,于是趁刘晏不在家时来了次突击搜查,结果打开箱子,里边只有一些书籍、账册、笔墨等物,原来这些账册都是刘晏所经手的赈灾、军饷、税收等财政记录,与官府所存的档案一一对应,用于自查核对,以防疏漏。肃宗见此,十分愧疚,在抚慰刘晏的同时,严惩了诬告者王缙。

唐德宗时,刘晏遭新任宰相杨炎陷害,入狱不久便被秘密杀害。抄家时令德宗皇帝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掌管天下钱粮数十年的大臣不仅没有万贯家财,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器皿都没有,搜遍犄角旮旯,“唯杂书两车,米麦数斛”。唐德宗渐渐醒悟,后来为刘晏平反,追封他为司徒。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刘晏为百姓所讴歌,受千古之景仰,不仅在于他出色的才能,更在于他一身正气、洁白如玉的品格。

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述:“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在古代,岁首之日并不是今天我们认定的公历1月1日,而是农历正月初一,是百姓口中最重要的“新年”。作为辞旧迎新的节点,元旦历来是文人墨客的吟诵热点,元旦的文化脉络也因此在平仄韵律中代代相传,至今读来仍唇齿留香。

古代元旦之日,最盛大的场面莫过于宫廷朝会。南朝梁代沈约的《梁三朝雅乐歌》便为后世留下了生动记录:“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趋拜齐袞玉,钟石变箫韶。”玉饰的朝服在晨光中齐整排列,雅乐从钟石之声转为箫韶之韵,字句间尽是对国运昌隆的祈愿。三国时期,曹植的《元会》则描绘了宴饮的热烈:“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文武重臣齐聚高堂,举杯共贺新岁,尽显曹魏宫廷的非凡气象。唐代时,元旦朝会的规模更胜往昔,连外国使臣都远道而来参与盛典。诗人厉玄在《元日观朝》中写道:“玉座临新岁,朝盈万国人。火连双阙晓,仗列五门春。瑞雪销鸳瓦,祥光在日轮。天颜不敢视,称庆拜空频。”大殿之上帝王端坐,阶下百官与来自异域的使者济济一堂,共同虔诚地朝着御座方向叩拜。

相较于宫廷诗的规整,友间的元旦唱和则增添了几分随性与温情,成为文人雅士庆贺新岁的独特方式。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一段诗坛佳话:内阁首辅申时行与诗人王穉登同乡同龄,二人早年间便结下深厚情谊。申时行罢归乡后,每逢元旦必定亲手写下一首七律寄赠王穉登,对方收到后即刻和诗回赠,随后将两首诗一同贴在书斋的墙壁上,整日观赏,直到来年新诗作成才换下旧稿。如此年年往复,整整二十二年从未间断!这份以诗为媒的情谊,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不已。

翻阅典籍,其实,元旦的烟火气更多藏在老百姓的欢声笑语里。明代诗人陈献章的《元旦试笔》堪称一幅鲜活的民间贺岁图:“邻墙旋打宾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邻家的酒坊正忙着酿造待客的佳酿,孩子们高声吟唱着贺岁的诗篇,家中的老者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致,扶须轻叹又逢新岁,想到春日将至花枝满庭,眉眼间尽是笑意。这短短二十八字,将元旦日的居家宴请、

吟诗诵词迎元旦

钱国宏

孩童欢歌、老人抒怀尽数描绘,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宛如一幅动感十足的新年嬉乐图。唐代诗人孟浩然则将目光投向了田间地头,他在《田家元日》中写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北斗星斗柄转北,新岁开启,已过四十的诗人虽未得俸禄,仍牵挂着农事。他走到田间与耕父闲话,跟着牧童的身影漫步,听闻农人依据天象预测今年丰收,心中满是欣慰。这首诗没有宴饮欢歌,却将农家元旦的质朴与对丰年的期盼写得真切动人。清代诗人张维屏的《新雷》更显巧妙,全诗未提一个“元”字,却处处透着元旦的生机:“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寒暖冬去即将过去,万物已悄悄酝酿生机,只待新年第一声春雷响起,便绽放万紫千红,将人们迎新春的喜悦藏在了自然景致之中。

王安石的《元日》是历代元旦诗词中流传最广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屠苏酒的暖意、初升朝阳的光辉、新换桃符的鲜亮,交织成一幅热闹祥和的新年图景。更难得的是,这首诗还藏着诗人推行新政的豪情——彼时王安石初任宰相,决心革新除弊,诗中“换旧符”,抒发的是他破旧立新政治抱负的决绝。王安石在《增补重订千家诗》中点评道:“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的行军政,陈旧布新,顺始行己之政令也”,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诗句背后的深意。

进入现代,元旦的内涵有了新的延伸,诗词也随之承载了更宏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的《如梦令·元旦》便是如此:“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首诗没有传统元旦的欢腾景象,却以简洁有力的笔触,记录了红军行军的路线与方向。山路崎岖、青苔湿滑,红军战士却目标坚定,直指武夷山下,那迎风招展的红旗,既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也为元旦注入了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公历1月1日,“元旦”的日期虽有变化,但它所承载的辞旧迎新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未改变。